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章建刚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章建刚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建刚集 / 章建刚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ISBN 978-7-5482-2310-8

I. ①章… II. ①章… III. ①文化产业—中国—文集
IV. ①G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3372号

策划编辑：陈 曜
责任编辑：陈 曜
装帧设计：郑明娟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875
字 数：308千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2310-8
定 价：62.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作者简介



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蓝皮书主编；文化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事务部际协调机制成员、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

曾长期从事美学、艺术史研究，著有《艺术的起源》《如何规定艺术》等美学专论。2000年以来，密切关注文化发展理论与文化政策研究，涉及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各类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等重大专题，尤其开始运用文化经济学理论对问题进行分析。近年来也在不少高等院校、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或地方领导讲习班上就有关文化发展及文化政策进行讲演。2004年以来，一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跟踪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制定与贯彻工作。2010年以来，多次参加国家民委文宣司组织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调研活动。主要出版著作有《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文化经济学视野的搭建》（论文集），主要发表论文有《遗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理想模式》《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基本逻辑》《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与政策环境》《打造高质高效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需要的政策、机制与工作措施》等。

出版前言

我国的文化产业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人们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中走出来，被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在宽松的环境中得到初步释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文化市场也逐渐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复制与传播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为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产业破土而出。而到 21 世纪初，由于我国加入 WTO 后对开放国内文化市场的承诺，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有了新的挑战与机遇。2000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与管理，推动产业发展”；2001 年 3 月，发展文化产业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从此，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出萌芽期，进入起步期。2003 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开启，催动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0 多年来，文化产业业态逐步完备，新兴产业业态不断产生，法人单位与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文化产业增加值均高于同期 GDP 年均增长速度。即使曾遭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文化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4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3340 亿元，至 2013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 21351 亿元。今天的文化产业，更随着国家的战略谋划，逐渐广泛、迅速地融入互联网，向着特色化、纵深化和国际化转型升级，不断创新发展。

毋庸置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驱动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政策驱动的过程中，理论的探索与提升仍然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十多年来，一批学者从文化学、文

艺术、艺术学、美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转入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与探索，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差异辨析，文化产业的范围和门类划分，文化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确立，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文化产业政策制定、文化体制改革，到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区域性发展等，结合理论与实践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还有一些高层管理者，出于工作的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对一些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以指导实践。这些理论研究与探讨，有的是对文化产业实践的总结与提升，有的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设计与期许，有的切实反映了文化产业的现实状态，也有的与现实还有一段距离。而正是在不断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中，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逐步地丰富和完善起来，并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成果无疑都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我国文化产业曾经走过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十多年来风风雨雨的发展轨迹。

本丛书收取了十位全国有影响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者及学者型的高层管理者十多年来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一定全面，但具有代表性。而正如不能说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熟，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同样不能说已经成熟完善，有成熟的研究方法与学科规范，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本丛书希望通过此前一阶段理论成果的集中回顾，使广大读者和相关从业人员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梳理历史，更好地把握与理解现实，从而更自觉地创造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编委会
2015年5月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编委会

主编 施惟达

编委 李 炎 周永坤

林 艺 郑 海

目录

- 001 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文化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013 对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 032 按改革的思路，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学习十六大报告的点滴体会
- 039 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基本逻辑
- 063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文化体制改革促产业发展
- 070 文化市场的空间分析
- 076 划分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标准及其意义
- 086 扩大市场准入，学会依法监管，稳步有序开放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需要的政策、机制与工作措施
- 097 中国文化产业现状：数字与其结构性缺陷
- 109 艺术品的价格构成和艺术市场的产业化程度初探
- 118 宋庄的另类生产
- 130 也是一种想象
——知识经济时代的艺术投资和“宽视现象”的启示
- 140 浮现中的生活、艺术与市场
——九棵树数字音乐产业集聚区调研纪实
- 150 中国“舞”台原创与市场的突破点

- 160 创新合作模式，资源涌流，财富激增
——什么是 R&V 非竞争性战略联盟模式
- 166 文化遗产的真确性价值与遗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三重目标
- 195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尊重其民俗制度基础
——以山西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保护为例
- 220 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立场
- 231 民族手工艺产业发展传承需要市场政策扶持
- 242 发展问题，还是安全问题？
——滇桂边境民族地区“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调研报告
- 264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市发展战略：东部与西部
——无锡和丽江的比较
- 280 打造本地艺术市场，营造创意通州，推进国际新城建设
- 290 西湖：一个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创新
- 301 文化引领农村发展
——大村经验的文化经济学分析
- 311 跋：行进在文化经济学的路上

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文化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文化是人及其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哲学反思的对象。而发展是一个从属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其含义复杂而微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年）中说：“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当它实现时，文化与发展合二而一。历史也表明，所有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即发展）最终都会遭遇独特的文化课题并给出新的解答。中国并不例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新迄今已历经近百年的艰辛尝试。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创新始终是一个强烈的冲动。它是中国现代化重要的内在动机：传统的中国思想与文化必须完成现代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要表现为文化的创造：全球化也要求文化表达的多样性，要求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元素。因此这里我们不讨论抽象的文化，而是希望将文化与发展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具体的、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

一、科学发展是有文化发展内含的发展目标

（一）科学发展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同步提出、互为表里

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走过了成就辉煌的30年。今天反观过去，不仅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看人类认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相信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当年对改革的设想是有着深刻的理论蕴含的，不能想象匆忙中的权宜之计可以支持中国长达30年

的迅猛发展。然而发展的进程也会带来一些当年无法料想的问题。记得我们曾将“万元户”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去憧憬，而今回想起来不禁让我们哑然失笑。与此同时，环境的迅速恶化和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也屡屡令我们惊愕！至于分配不公及腐败带来的社会动荡，更是让我们常常感到无奈与绝望。中国发展的总观念迫切需要调整！

2003年10月，科学发展观第一次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对其进行充分论述。它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而通过对中央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学习，我们特别注意到，在科学发展观被酝酿、提出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文化主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响亮。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表述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内容。这是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2003年，历时三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有关省市、部门全面铺开；2005—2007年，构建逐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想在党中央各项重要文献中清晰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让文化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文化发展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地位、作用被空前地标示出来。

（二）文化发展是中国在全球化、后现代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让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必将让它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发展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全球化的现实又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同时具有后现代或者叫第二次现代化的性质，必须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征。

所谓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或者新一轮现代化，都是指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逐渐出现的“知识经济”和“丰裕社会”的趋向，指现代化过程进入全球化新阶段和更快增长期。这时不仅经济过程中调用的知识流日益丰沛，社会产品不断下游化，终端消费品不断增加设计和审美的要素；而

且人们对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精神性服务有极其巨大的需求增长，用鲍德里亚的话说，生产的逻辑被消费（或者浪费甚至破坏）的逻辑取代了。^① 知识经济是高科技和高文化的联姻（high tech, high touch）^②；媒体的迅速过剩突显内容的稀缺，尤其是具有高质量唯一性的文化内容的稀缺。文化市场几乎成了一只贪婪的饕餮：消费者几乎无选择地吞食各类文化产品，而文化企业则几近疯狂地吞食各类文化资源。于是不仅是西方各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西方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政策，以求得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说，市场的竞争同时就是文化的竞争！可以说，瞄准了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发展就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了对“新发展观”的探索。

所谓后现代，既是现代化动机的正向延伸，又是对现代化动机的反省和矫正。它要纠正现代性的单向度和偏执，克服商业文明的过度投机。因而后现代不仅主张更精细的前瞻，也主张与前现代进行对话（而不是简单的决裂）。这时，后现代不是对前现代的重新认同，而是要在现代与前现代的裂隙间释放更多的差异，强调更多的中间状态与互动。这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主张。

后现代发展展示出经济全球化具有超越种种具体的传统文化、主张积极寻找普遍交往中势必通行的普遍伦理（universal ethics）的一面，同时又让现代与前现代的对话更多在文明间展开。这样的局势一面将更多“边缘国家”（沃勒斯坦语）拉入全球化；另一面由于文化多样性的主张更多肯定了各种文化的自决发展权利，因此也为这些“后发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某种相对有利的发展机遇。“后发国家”多一分从容便可以在内部发展动机的驱使下，将更多传统价值经过创新带入具有后现代因素的现代化进程。这时，与发达国家进行有效文明对话成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卷入全球化的中间环节和有益前提。现在“普遍伦理”不是一个既成的尺度，而是一个处于形成中的

^① 参见《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国家创新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第五版。

构造（inter-culturality）。

30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初步的，而且是片面的。例如人们常常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而所谓“世界工厂”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还意味着中国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国家发展和各类企业效益增长过程中，这些劳动力拿不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国内的消费需求很少增加，人的全面发展被忽视，世界上有很多“中国制造”却很少有“中国创造”。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并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分配的差别越来越大，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冲突在增加，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为所有中国人所共享；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变得贫瘠。因此就像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发展观取代了增长观，现在我们也正以科学发展观取代粗放的、唯GDP增长的发展观。我们需要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创造对经济增长加以滋补，需要理论对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社会制度进行伦理学的说明。贯彻科学发展观最终是要以调动与发挥中国人的创造性为目标，这才是以人为本；要以建设和谐公正的公民社会为目标，这才需要有全面协调；而要以改革开放为基本推进模式，这样的发展才是渐进和可持续的。这样的发展将包含越来越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课题。所以说，改革开放的中国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文化的创造！科学发展观注定同时是文化发展观、以文化发展为标志的发展观。

中国文化有“走出去”的要求，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也要求各国政府的出场，而政府的出场和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都要求道义的出场。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举动受到了世界的嘉许！但中国承办奥运会的意义显然不终止于2008年，我们表达的是对人类和平责任的承诺。因此我们还急迫地需要含义更清晰的道义表达！

（三）文化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路径和新的学科范式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极为简单地回顾一下30年来文化研究的

历程。

粗略地说，改革开放 30 年的文化研究有这样几个阶段：20 世纪的 80 年代学术界有“文化热”；90 年代有“国学复兴”；而进入 21 世纪，文化发展的研究成为一个影响日渐巨大的研究潮流。^①

这些文化研究的社会影响是值得反思的。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发生在“文革”和闭关自守时期之后，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中国）人”觉醒了。中国和世界迅速接近，中国人的改革发展积极性与首创精神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但这些研究具有抽象和理想主义的特征，而且和社会改革的进程相对脱节，最终为社会动荡所终结。90 年代的文化政策对内是“不争论”，对外是“韬光养晦”，在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国学”成了一种“显学”。然而这种没有竞争、一厢情愿的学术研究虽然能起到一些普及传统文化的作用，却很难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传统文化的脱胎换骨不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最近 8 至 10 年的文化发展研究还相对稚幼，尚未产生太成熟的学术专著，但它紧紧地踩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鼓点上，为国家及地方的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国际文化政策合作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咨询服务。反之各种社会需求（政府的、企业的）正催促着文化发展研究深化自己的理论。

二、新的文化研究将是对文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的研究

文化发展研究与文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比的幼稚特征和它在我

^① 在首届中国博士后文化发展论坛（2008）上，贾旭东的论文提供了一组统计数字：“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8200 多种重要期刊上，文献标题中含有‘文化发展’的文献，1995 年至 1999 年各年度的数量分别为 87、85、65、87、109 篇，而 2000 年至 2007 年各年度的数量分别为 130、143、197、226、189、224、285、316 篇。2001 年至 2007 年 7 月间的文献数量为 1580 篇，比 1991 年至 2000 年 10 年文献综述 732 篇翻了一番还多。”（《论文集》〔未刊行〕第 16—17 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发展研究的兴起。

国发展中受到欢迎的程度似乎并不匹配，但并非不可理解。反之，国内的文化发展研究与国际上文化研究潮流高度吻合。

(一) 国际文化研究的传统与流变

19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文化研究有两个源头：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精神科学”（人文哲学）。前者在美国就成了社会学；后者在德国是当代的存在主义、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包括伊格尔顿这样的英国学者）。两者的方向有些悖逆。虽然二者都关心并直接切入文化的内容（宗教、价值、伦理、终极关怀等），但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不同文化（cultures）间的差异、是复数形式的文化，而且力图将其固定下来以便识别；而人文哲学探讨的是生活或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或本真的存在，是带定冠词并大写的文化。后者尤其注意到文化是不断变动、成长、超越的，因此是很难被固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当时这两个学科似乎是分别发展的：一个是思辨哲学，另一个是经验科学；一个是规范性的，一个是描述性的。直到20世纪的70年代前后（如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的两条轨迹仍各自独立延伸。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变化。曾经被无穷向后追溯的“落后文化”和永远射向未来的“文化本质”被两极拉开，张力突显。因此后来的工作注定要消弭这个差距。果然，德国思辨哲学的风头被同样高度思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取代了；而知识经济或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给美国的文化社会学带来了研究形态上的变化。这背后似乎同样是胡塞尔现象学传统的影响。

文化在人的研究中被突显出来。人抽象的本质是一种被意识到的理想，在现实中人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实践）去争取“承认”。这时，可以将每个个人与共同体区隔开来或联系起来的中介物就是文化，人们相互争取承认的权力（武器或工具）也是文化，而将人的所有实践呈现和记录下来的就是文化符号。这时的文化不仅是符号，而同时是制度、权利，也是传统与变革。这样主体才能从大写的人落实成为小写的人，或不同规模的复数的人（群体）。

以这样的认识研究文化，文本、符号、书写或者作品的功能与构造被从新的角度予以揭示。“解构”仍是一种理解与揭示，是对“发展中”“目的实现中”的动态描述。反之，复数文化的研究也放弃了对“原汁原味”的心理投射倾向。事实上没有什么“原始文化”，有的只是前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与不尽相同的现代化途径。

于是我们看到大陆哲学关注对历史的解读（福柯）及解读方法问题（德里达），力图说明文化在实际交往过程中不断被拆解和建构的过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美国的文化社会学则关注到“记录文化”（recorded culture，戴安娜·克兰），关心通过记录文化所实现的文化变迁。后者那里，终极的东西、高远的理想、事物的本质被搁置了，更为复杂的动态文化互动模式被认真地揭示出来。这些研究揭示的只是美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与文化成长的特殊道路。

20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北美）文化社会学不断扩张，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在分崩离析，视野变得宽广而散漫，用克兰的话说就是形成了一个正在“浮现中的理论视野”。这是所谓的社会学与多种学科相融合，形成新的景观。文化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高度融合，形成了诸如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文化政策学、文化政治学或媒体政治经济学等新的学科。这些学科把文化发展的制度问题突显出来。

这些学科的重要经典、开山之作往往都还是些论文集，它们的序言中往往写着“二三十年前这样一个学科还无法想象它的存在”等等。传统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家很少关心文化艺术问题。^①但近些年来一些像模像

^① A. 皮科克（A. Peacock）和 I. 里佐（I. Rizzo）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与文化政策》一书（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4）的“编者前言”中说：“‘文化经济学’是时代的产儿。一本专门的刊物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而一个专门的‘文化经济学’子目录最近也被添加进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著名的《经济学文献杂志》的经济学文献分类表。这与30年前的情况有天壤之别。”W. E. 庞莫莱纳在《文化经济学》（R. 陶斯和 A. 卡基主编，Springer – Verlag, 1992）的“前言”中说：“10年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听到一个叫作‘艺术与文化经济学’的题目都会很诧异。那时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就此写什么文章，除非他们对艺术有个人兴趣。而其中之一正是 A. 皮科克。他在 1969 年撰文分析对文化艺术的公共促进问题。”汉斯·桑德为该书作的另一篇“前言”也说：“文化经济学，如同其名称所意指的，是两个研究领域：文化与经济。这两个领域传统上被认为是冤家对头。”

样的文化艺术经济学著作（甚至中译本）已经问世。它们从知识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现实中看到了真正的理论问题，例如文化及文化多样性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考恩：《商业文化礼赞》《创造性破坏》）、文化消费的商业交易方式问题（J. 里夫金：《付费体验的时代》）、文化产业组织中的合同问题（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大众生产时代的社会分层与文化权利问题（霍尔和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传媒的政治经济属性（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等。这里要探讨的都是文化作品作为商品存在时其经济属性如何、其经济属性是否会干扰或助长其文化属性的发挥的问题，以及在一种商业社会制度条件下文化本身如何发展、成长的问题，政府是否应以公共财政资助精致艺术的问题等。这些都是些实实在在的文化发展问题。在这样的潮流中我们看到，由于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纯粹思辨的警惕与克制，19世纪两种文化理论的背离现在消失了，两个传统在方向上统一了，尽管方向本身变得较为含混了。这就是所谓后现代的迷惘（丹尼尔·贝尔）。

这也就是说，国际上的文化发展研究兴起时间还不长，大约是从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的。但他们的一般学术发展比我们好，因而理论成果更成熟一些，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尤其意识到，相对抽象的哲学思考通过具体的社会科学，实际地干预了社会发展进程。

（二）文化发展研究的学科基础

文化发展研究与一般的文化研究不同。它要解决的是文化发展的宏观环境与条件问题，而不是文化的本质和定义问题，也不是研究文化生产的所谓“内部规律”问题，如作家的创作心理学问题、艺术形象的塑造问题或艺术表现手法问题。反思近年来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也逐渐认识到，所谓文化发展研究实际上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群，通常需要让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所谓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结合起来，更细的研究还涉及财政学、行政学、管理学、政策学等等。因此我们也需要重新学习新的知识，